

第四章 庞巴维克与资本理论

导言

欧根·冯·庞巴维克 (Eugen Böhm-Bawerk, 1851 — 1914), 卡尔·门格尔最出色的学生, 继门格尔之后, 对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下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庞巴维克先是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 然后在维也纳任政治经济学教授, 他也曾几次担任奥匈帝国的政府部长。他不仅对门格尔提出的主观主义理论作了完善和发展, 而且把这一理论应用到了资本和利息理论中, 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庞巴维克撰写了极为重要的著作《资本与利息》(1884—1902), 这本书不限于书名所示, 而是一本完整的经济学著作。在这本书中, 庞巴维克围绕主观的、动态的价格理论, 提出了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核心。(幸运的是, 这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已经有西班牙文版了, 因此西班牙学生可以在大学经济系的学习计划中把这一课补上。尽管资本理论的分析对于理解市场过程至关重要, 但是在他们大学的学习计划中却有意地缺失了。)

除了推动资本理论的发展外, 庞巴维克还对已有的利息形成理论进行了毁灭性的批评, 他的批判性分析针对的主要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 以及以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为基础阐述利息的理论。庞巴维克进而以时间偏好的主观感知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利息形成

理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托马斯主义者莱西恩的吉勒首先确定了这一原则，后来 16 世纪末马丁·德阿斯皮奎塔在莱西恩的吉勒的著作中重新发现了它。尽管从解释利息的角度看，庞巴维克的贡献并非绝对完美，他在最后几乎是无意识地陷入到了他自己著作第一卷中激烈批评的资本边际生产力理论中，但是奠定资本和利息理论核心基础的还是庞巴维克，后来弗兰克·A. 费特（Fetter，1977）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Mises，1996：483 - 490）使这一理论变得完善，并得出符合其逻辑的理论结论。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最初由庞巴维克提出，后来由他的主要学生予以完善的资本理论的基本原则。

作为一系列主观阶段的人的行为

我们首先从把人的行为定义为任何有意识的行为（behavior）或行动（conduct）开始（Mises，1996：11 - 29）。正如我们已经阐述的，人们为了实现他们认为重要的目标而行动，为了完成目标，他们使用一系列其认为适合那个目标的手段。价值和效用分别指的是行为者对目标和手段的心理评价。根据定义，手段必然是稀缺的：假如行为者不认为对应于其目标的手段有稀缺性，那么他们甚至不会在行动前把它们考虑在内。目标和手段不是“给定的”，相反是源于人的基本的企业家行为，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阐述的，这一行为本身便包括创造、发现或意识到哪些目标或手段对所遭遇的具体情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行为者认为他们已经发现哪些目标是值得追求的，他们也就形成了关于那些可用来实现目标的手段的想法，然后他们结合两者形成行动计划，并在行动意愿的支持下开始实施。

因此，计划是由行为者想像出来的一幅关于其行动可能涉及的未来不同阶段、因素和情境的心智图景。所有人的行为都是在时间过程中发生的。我们这里所指的不是时间在决定论或牛顿意义上的

概念（也就是说，纯粹物理的或类比的），而是主观意义上的概念，也就是行为者在其行为背景中对时间的主观感知（O'Driscoll and Rizzo, 1996: 52 - 70）。因此，时间是与人的行为概念不可分离的经济范畴。我们不可能想像一个行动不是在时间过程中发生的，或者说一个不花费时间的行动。另外，正是当行为者开始行动，然后结束行动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时，他们感知到时间的流逝。人的行为——总是为了实现目标或消除不适——需要实现和完成一系列连续的阶段，这不可避免地需要花费时间。因此，把行为者和他们要实现的目标分隔开来的正是构成他们行动过程的一系列连续阶段所要求的时间。

行为者对未来的主观看法总是存在如下趋势：当一个行动所要求的时间增加时（也就是当构成行动的连续阶段的数量和复杂性增加时），行为的结果或目标就会变得对行为者更有价值。因而也很容易理解这一经济原则：人的行为过程要实现的目标的价值越大，这个过程就越长。实际上，假如情况不是这样，即行为者没有赋予更长行为的结果以更大的价值，那么他们就绝不可能实施它们，而将选择较短的行为过程。正是某种长度的时间（也就是完成他们行为过程中不同阶段所需的时间），把行为者与他们的目标分隔开来，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显而易见人总是试图尽快地完成目标；只有当他们主观认为延迟目标的实现将实现更有价值的目标时，他们才会愿意那样做。

我们现在来讨论时间偏好的逻辑范畴，它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行为者倾向于尽快地满足其需求或实现其目标。换句话说，当行为者考虑两个对其有相等主观价值的目标时，他们总是倾向于在时间上更接近的那个。一言以蔽之，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人们总是喜好“当前物品”而非“未来物品”。这一时间偏好规律只是每个行为者在其行为过程中总是力求尽快实现目标这一基本原则的另一种表达。因此，时间偏好不属于心理范畴或生理范畴，相反，它构成了所有行为在每个人头脑中所呈现的逻辑结构当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上面描述的趋势和时间偏好规律只是表达同一事实的两种不同方法。根据前者，行为者实施花费更多时间的行动是因为他们希望据此实现更有价值的目标；根据后者，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行为者总是倾向于在时间上最接近他们的物品。

资本和资本品

“资本品”这个词表示的是被行为者主观看做是每一行为过程的中间阶段的事物。换句话说，所有行为者主观视做是中间阶段的，并且体现在他们所采取的生产过程当中的，都是资本品。因此，资本品总是要放置到一个目的论 (teleological) 的背景中，在其中，决定性因素是所追求的目标以及行为者关于完成目标所必需的阶段的主观视角 (Kirzner, 1996: 13 - 122)。

因此，资本品是卡尔·门格尔提出的“高级经济财货”，或者换句话说，是在特定行为过程中的每一中间阶段“物化”出来的生产要素。另外，资本品是随着三种基本要素——自然资源、劳动和时间——的积累而出现的，所有这三种要素通过人类设想和发起的企业家行为过程结合到了一起。

生产资本品的必要条件是储蓄或放弃当前的消费。实际上，在一个行动过程中，行为者只有先放弃实施会有即刻产出的行为，才能够实行连续不断和时间花费越来越多的中间阶段。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放弃实现满足即刻需求因而从时间上说也是更临近的目标 (消费)。为了说明这一重要的概念，我们使用庞巴维克用以解释资本品的储蓄和投资过程的例子，这个例子讲述的是单个行为者在孤立状态中的行为过程 (鲁宾逊·克鲁索在孤岛上)。

我们设想鲁宾逊刚刚抵达孤岛，只能以采集草莓为生。每天，他都耗尽所有的精力采集草莓，不仅足够维持生存，甚至能够几天之用。这样吃了几个星期之后，鲁宾逊有一个创造性的发现，如果有一根几米长的木棍，他可以接触得更高和更远，借此用力击打，

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收集到更多草莓。唯一的问题是，他预计找到合适做木棍的树枝、去除枝叶和瑕疵将要花费五整天时间。在这段时期，他只好被迫停止采集草莓。假如他想制作一根木棒，那么他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每天的草莓消费，并且把剩余的草莓储存在篮子里直到积累到足够维持五天的数量。在计划好他的行动之后，鲁宾逊决心开始实施，因此他必须首先减少每天草莓的消费量。这显然代表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牺牲，但是他认为为了实现他期望实现的目标，这种牺牲是很值得的。因此，他决心在十天内减少消费（换句话说，就是储蓄），也就是说，他要在篮子里储存剩余的草莓，直到他认为积累的草莓数量足够维持他生产木棍之用。

利用这个例子，庞巴维克表明每一资本品的投资过程都要求事先的储蓄，也就是减少消费，降至原本可以达到的水平之下。一旦鲁宾逊已经储存了足够数量的草莓，他将花费五天时间寻找一根可做木棒的树枝，把它从树上取下并且加工完成。在他准备木棒的五天里，这时他被迫中断日常草莓采集的生产过程，那么他吃什么呢？他只要消费他前十天积累在篮子里的草莓就可以，在那十天里，他从“用手采集”的草莓中储存了必要的部分，并且忍受了一定程度的饥饿。就这样，假如鲁宾逊的计算是准确的，那么在五天之后，他将有一根木棒（资本品），它代表从直接用手采集草莓这个生产过程中放弃的时间（五天）而实现的中间阶段。

鲁宾逊必须尽可能地协调他当前的行为和可预见的未来行为。更准确地说，他必须避免实施相对于他的食物储存来说时间过长的行为过程：在他生产资本品的半途，在他实现目标之前，如果耗尽了储存的全部草莓，那无疑将是一个悲剧。另外，相对于他未来的投资需求，他也不能储存太多，因为这样做，他只不过是不要地牺牲了他当下的消费。正是鲁宾逊对他时间偏好的主观评估促使他充分地协调或调整他当下行为与预计的未来需求和行为。一方面，他的时间偏好不是绝对的（absolute），这使他有可能牺牲几天当前的消费，以冀望于生产木棍。另一方面，他的确具有时间偏好，这

又解释了为什么他只能把精力用于生产他能够在有限的时期内生产出来，并且要求他牺牲（储存）有限天数的资本品。无论如何，真实储存的资源（最初体现在篮子中的草莓）正是使鲁宾逊在他为生产资本品而停止直接采集草莓那段时间生存下去的资源。逐渐地，当鲁宾逊花费时间，依靠当初储存的消费品而通过创造性过程把劳动和自然资源结合在一起时，某些资本品（储存的草莓）就会被其他资本品（木棍）替代。

在现代经济中，很多经济主体同时执行不同的功能，资本家是那些执行储蓄功能的经济主体；也就是说，他们的消费相比他们的创造或生产要少，他们提供给工人在参与生产过程时生存所需的消费品。（鲁宾逊储存草莓，以使他在后来生产木棍的时候能够生存下来，他的行为就像一个资本家了。）因此，当资本家储蓄时，他们就腾出了资源（消费品），这些资源可用于维持工人不从事最终消费品的生产，而直接把精力用于生产性环节，也就是资本品的生产。

与鲁宾逊的情况不一样，在现代经济中，生产结构极为复杂，它扩展至极为漫长的时期，其中包含众多阶段，所有这些阶段都相互关联，并且被分成无数的次级过程，被人们采取行动计划加以实施。

例如，制造一辆小汽车这个过程包含的生产结构就有成百甚至上千个阶段，从构思车的设计（离最终消费最远的阶段）的那一刻开始，它要从供应商那里订购相应的材料，在不同的装配线上使用这些材料，为发动机和所有的配件订购不同的零件等，直到抵达最靠近消费的阶段，例如运输和配送给经销商，宣传推广，把车展示并销售给公众，这需要非常长的时期，甚至几年（Skousen, 1990）。

显然，正如拥有木棍的“富有”的鲁宾逊和没有木棍的“贫穷”的鲁宾逊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通过以前的储蓄获得了资本品一样，富有的社会和贫穷的社会之间的本质差别不在于前者更努力地工作，甚至也不是前者拥有更多的技术知识；相反，而是在于富有

的国家拥有一个更加扩展的、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得到了合理投资的资本品的网络。这些资本品包括机器、工具、计算机、软件、厂房、半成品等，它们源自该国居民以前的储蓄。另外，在构成现代经济真实生产结构的极为复杂的网络中的资本品不是永久性的，而总是临时性的：在生产过程中，它们的实物被消耗或使用完，或它们变得过时了。这意味着假如经济主体希望保持资本品完好无损，他们必须解决资本品的折旧或损耗等问题；而假如经济主体希望进一步增加阶段，延长过程，提高生产力，那么他们的积累甚至比为抵消低摊销率（amortization rate）所要求的最低数量储蓄要更多些，摊销率是描述资本品折旧的会计用语。

并且，作为一般性规则，对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来说，资本品是难以相互转化的，离最终消费阶段越近，其可转化性就越差。因此，假如情境改变了，假如行为者改变想法或认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错误，那么到那个时刻为止他们生产的资本品将变得毫无价值，或者只有经过花费高昂的转化之后才可能有用。

我们现在进一步来考察“资本”概念，从经济的角度看，它与“资本品”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将把“资本”定义为“资本品”的市场价值，一个由在自由市场中买卖资本品的个体行为者估计的价值。因此，我们看到，资本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经济计算的工具。换句话说，它是企业家认为资本品将会具有的市场价值的主观评价或判断，以此为基础，他们不断进行买卖，试图在每一交易中赚取最大的企业家利润。要不是有市场价格以及对构成生产过程中间阶段的资本品价值的主观估计，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就不可能估计或计算用资本品生产的商品的最终价值是否抵消了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也不可能把参与不同行为过程中的人们的努力协调一致。

因此，在一个既没有自由市场，也不存在市场价格的计划经济中，讨论“资本品”是可行的，但说到“资本”就不行了。自由市场的缺少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强制干预，或多或少阻碍了企业家才能

在资本品领域的发挥，结果导致了经济的系统性和跨期的失调。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奥地利学派的计划经济经济计算不可能性理论正是以这一思想为核心的。因为没有企业家才能的自由发挥，没有资本品和货币的自由市场，就不可能对生产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水平和垂直扩展进行必要的经济计算，干扰社会并且阻止其协调发展的普遍失调行为就会接踵而至。在企业家的跨期协调过程中，一种重要的市场价格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前商品相对于未来商品的价格，这种价格常常被称做“利率”，它支配了现代社会中消费、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在下一节我们将对它予以详细的考察。

利率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未来商品，在其价值尺度上，人们总是给当前商品更高的评价。然而，这一主观评价上的差别，其相对心理强度因人而异，甚至同一个人在其一生不同时期也可能变化很大，这取决于他们各自特定的情境。这种当前商品相对于未来商品的主观评价在心理强度上的不一致性，这种反映在每个行为者价值尺度上的不一致性，意味着在一个由很多经济主体构成、其中每个经济主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和可变的时间偏好的市场中，将会出现各种双赢的交易机会。

因此，有低时间偏好的人将愿意放弃当前的商品，以换取未来评价只高一点儿的商品，他们将把当前的商品移交给有更高时间偏好的人，也就是那些比他们对当前商品有更高评价的人。在企业家才能中的创造性和警觉特质会推动当前商品相对于未来商品的市场价格的形成。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看，利率就是当前商品相对于未来商品的市场价格。

因此，在利率形成的市场中，当前商品的供应商或售卖者是储蓄者，他们相对来说更愿意放弃当下的消费以换取未来有更高价值

的商品；当前商品的需求者或购买者是所有那些消费当前商品和服务的人，他们可以是工人，或是自然资源、资本品的所有者。实际上，这样的市场包含了社会整个的生产结构。在这里，储蓄者或资本家放弃了当下的消费，并把当前商品供应给初始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工人和自然资源的所有者）以及资本品的所有者，以换取将来产出的具有更高价值的消费品（或资本品）的全部所有权。假如我们排除纯企业家利润（或亏损）的正面（或负面）效应，那么这种价值上的差别将与利率一致。

正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强调的，所谓通过支付相应的利率来获取贷款的“贷款市场”，只是当前商品与未来商品相互交换的一般市场的相对无足轻重的一部分，后者涵盖了社会整个生产结构，在其中，初始生产要素（劳动和自然资源）以及资本品的所有者是当前商品的需求者，而储蓄者是供给者。因此，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市场只是一个范围更广的市场的子集，并且相对于这一市场来说，它的角色是次要的和从属的，尽管贷款市场对公众来说是最常见和最明显的体现。

在现实世界中，唯一直接可观察到的数据是我们所称的“毛利率”（gross interest rate）或“市场利率”（它与信贷市场中的利率一致），以及在每一阶段每一生产活动产生的毛利润。前者是由我们上述定义的利率（有时也被称为初始利率或自然利率），加上行动具有的风险溢价，再加上预期的通货膨胀或减去通货紧缩溢价构成的；第三个构成要素是为了反映交易所使用的货币单位预期购买力的变化。

后者则由我们上述定义的毛利率（或市场利率），加上或减去纯企业家利润或损失构成。由于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会导致企业家利润或损失在所有市场中趋向消失，每一时刻生产活动的毛利润趋向与市场利率相等。因此，如果一个公司的会计利润没有达到资本家在上一财政年度投资的资源所暗含的毛利率要求时，那么即便财会报告说有利润，公司实际上在遭受企业家损失。

在现代经济中，当前行为与未来行为通过市场中的企业家活动而得到协调。因此，如果储蓄越多，也就是说，被卖出去或供应的当前商品的数量越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相对于未来商品的价格就越低，于是市场利率就越低。这就向企业家表明，有更多可获得的当前商品，使他们能够增加生产过程中的阶段的长度和复杂性，从而使这些阶段更有生产力。相反，如果储蓄越少，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主体放弃当下消费的意愿就越小，市场利率也就越高。因此，高市场利率表明储蓄是相对稀缺的，这个清晰的信号提醒企业家必须避免过度地延长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从而避免失调和误调整对社会的健康、协调和持续发展产生的严重威胁。简而言之，正是利率告诉企业家什么时候应该而且可以上马新的生产阶段或投资项目，什么时候不可以，这才能够使储蓄者、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行为尽可能保持人力所及的协调，并防止不同的生产阶段过短或过长。

利率作为一种市场价格或社会时间偏好率，在协调所有现代市场经济中消费者、储蓄者和生产者的行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米塞斯和哈耶克所提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危机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利率的货币操控所导致后果的理论分析之上，货币操控致使经济主体的行为失调，因此严重地扭曲社会的生产结构，从而导致它不可避免地要通过经济衰退的方式进行痛苦的再调整或恢复。

庞巴维克 vs. 马歇尔

尽管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理论家在前面提到的方法论论战中结成了暂时的同盟，但是双方还有另外一系列吸引人的辩论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时候同时进行，庞巴维克也参与其中。

第一场辩论涉及庞巴维克和马歇尔。庞巴维克批评马歇尔阻碍了英语世界的人们清晰地接纳门格尔发动的主观主义革命，特别是他通过使用供给和需求函数来解释价格形成时试图复活李嘉图的

客观主义，至少在供给一方是如此：马歇尔使用了著名的剪刀比喻：两条刀刃（供给和需求）共同确定市场价格（均衡）。尽管马歇尔接受需求本质上是由对效用的主观评价决定的，但是他认为供给主要取决于对生产的历史成本（这个是“给定的”、已知的）的“客观”认定。

庞巴维克强烈反对马歇尔的学说，指出马歇尔从根本上忽视了这一事实，即成本也是主观评价（也就是一个人对他行动时放弃的其他目标的主观评价），并且货币成本只是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这个价格最终也是由对原本可用它们生产的可替代消费品的效用评价决定的）。因此，毫无疑问，马歇尔剪刀的两边而不是一边，都基于效用的主观评价（Böhm-Bawerk, 1959c: vol. 3, 97 - 115; 1962a, 303 - 370）。

庞巴维克 vs. 马克思

同样重要的是庞巴维克在《资本与利息》第一卷（Böhm-Bawerk, 1959a）中对马克思剥削理论或剩余价值理论的激烈批判。

针对马克思的观点，庞巴维克提出了如下看法。首先，不是所有的经济品都是劳动的产品。自然资源是稀缺的，对实现人的目标来说是有用的，因此它们构成了经济品，然而它们并不包含劳动。另外，包含同样数量劳动的两种商品可以有不同的市场价值，假如生产它们所需的时间有差别的话。

其次，商品的价值是主观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解释的，价值只是人们行动时对达成特定目标所需的手段的重要性的评价。因此，包含大量劳动的商品可能价值很低，甚至市场中根本不值钱，一旦行为者后来意识到它们对实现任何目标来说都没有用处。

第三，劳动价值理论家陷入到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循环论证之中：劳动决定了经济品的价值，而劳动的价值反过来又取决于（再

生产和维持工人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经济品的价值;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根本没有得到说明。

第四,在庞巴维克看来,剥削理论的支持者们完全忽视了时间偏好规律,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前商品总是比未来商品更值钱。这个错误使他们希望工人得到的要比工人的实际产出多,他们认为在工人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应该用现金把商品的全部价值都支付给工人,而这些商品的生产只有通过长短不一的时期才会完成。因此,只有两种选择:工人要么等待,直到生产过程结束,(与合作者一起)得到最终产品的全部所有权;要么他们作为雇员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预先得到最终产品的现值。然而,希望工人现在就得到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才会完成的产品的全部价值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这就要求支付给工人一个远远超出他们实际上创造的价值。

另外,庞巴维克写了一篇文章揭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试图解决他最初在第一卷中提出的剥削理论的错误和冲突时,所陷入的逻辑不一致和自相矛盾(Böhm-Bawerk, 1962 b: 201 - 302; 1898 [1949])。

庞巴维克 vs. 约翰·贝特斯·克拉克及其神秘的资本概念

总的来看,新古典学派遵循的是一个早于主观主义革命的传统,在其生产制度当中,不同生产要素以一种同质的、水平的方式生产消费品和服务。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在整个生产阶段的时间架构中,这些生产要素都是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的,这也正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考虑在内的方面。上述静态模型为约翰·贝特斯·克拉克的研究提供了框架,他进一步得出了其逻辑结论。克拉克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强烈的反主观主义思想在资本和利息理论领域至今还是新古典货币主义的基石。

实际上,克拉克认为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在他看来,生

产过程不是由不同的阶段组成的；在得到生产过程的结果之前，也不需要等待多长的时间。克拉克视资本为永久基金，它以利息的形式，“自动地”产生利润。这一社会的资本基金越大，利率就越低。时间偏好现象绝不会影响其模型中的利息（Clark, 1893: 302 - 315; 1895: 257 - 278; 1907）。另外，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奈特、斯蒂格勒、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芝加哥学派学者都完全同意克拉克的观点。

显然，克拉克的生产过程思想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思想在资本理论领域的应用。我们知道，瓦尔拉斯建立的一般均衡经济模型用联立方程组来解释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是如何决定的。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看，瓦尔拉斯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联立方程组中的变量或参数不是同时发生，而是随着经济系统中参与者的行为推动生产过程而序贯发生的。简而言之，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是严格的静态模型，它把从时间角度看原本是异质的量值联系在了一起：这个模型没有考虑时间的流逝，相反，它描述的是假想的、同时发生的变量和参数的相互作用，而这些变量或参数在真实生活中是绝不可能同时出现的。

用一个忽视时间因素并且明显缺乏对市场过程序贯引发的研究的模型在逻辑上是不可能解释真实的经济过程的。令人惊讶的是，克拉克所支持的这样一种理论，在经济学中迄今还被普遍接受，出现在大多数入门性的教科书中。几乎所有这些书都是从描述和解释不同经济主体（居民、公司等）之间生产、消费和交换的“收入流量循环”模型开始的。这种解释完全排除了时间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换句话说，这一模型是建立在所有行为都是同时发生这个假设之上，这是个毫无根据的错误“简化”，它不仅妨碍解决真正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也对经济学者发现和分析问题构成了几乎难以克服的障碍。

庞巴维克对克拉克及其学派的客观主义立场立即作出了反应。例如，庞巴维克把克拉克的资本概念描述为“神秘的”和“神话般

的”，他指出生产过程绝不依赖于神秘的、同质的基金，而是无一例外地依赖于具体资本品的共同作用，它们被企业家在一个花费时间的经济过程中进行构思、生产、选择和结合。另外，按庞巴维克的说法，克拉克把资本视为一种想像的概念，或“价值胶体”（value jelly），随时注入到具体物品中去。庞巴维克警告说：一旦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势必会导致经济理论在未来犯下致命错误。庞巴维克的确有先见之明：假如克拉克的循环、静态模型得以流行，那么长期被抛弃的消费不足学说将会不可避免地复活。后来凯恩斯及其学派的出现，证明了庞巴维克的预见（Böhm-Bawerk, 1895: 113 - 131）。

庞巴维克也认为以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作为利息基础的理论，如克拉克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庞巴维克指出，宣称利息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理论家，无法解释为什么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不能导致市场中资本品的现值等于它们预期产出的现值，从而消除整个生产时期中成本与产出的价值差异。庞巴维克认为，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理论只是客观价值思想的残余，根据这一思想，价值是由产品或服务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成本决定的。然而，是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相反，这一认识至少可以追溯到路易斯·萨拉维亚·德拉卡列。经济主体承担成本，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从生产的消费品中获得的价值要超过这些成本。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每一资本品的边际生产力，它最终取决于在资本品的帮助下生产出来的消费品和服务的终值。通过贴现，这一价值将得出资本品的现值（它与生产成本毫无关系）。

因此，利息的起源和存在必然独立于资本品，并且必然依赖于人的主观时间偏好。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克拉克—奈特学派的理论家会犯下错误，认为利率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我们只需要注意到，利息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相等需要以下条件：（1）没有变化发生的完全均衡环境；（2）把资本视为一种可自我复制的、无需解决折旧问题的神秘基金的思想；（3）把生产视为一种即时“过

程”，因此不花费时间。当满足这三个条件时，资本品的租金总是等于利率，但显然这三个条件既荒谬又不符合现实。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充满同步、即时的资本概念的理论家被这样假想条件下收入和利息在数学上相等所欺骗，由此得出理论上不可接受的结论，即生产力决定利率。奥地利学派学者则持恰恰相反的观点：不同的边际生产力（也就是未来收入流的价值）只决定每一资本品的市场价格（趋向于等于这一预期收入流以利率贴现的现值）；同时，当利率（取决于时间偏好）上升（或下降）时，通过对未来预期收入流根据利率所作相应贴现，将使得每一资本品的现值（市场价格）下降（或上升），而不论它生产的历史成本如何，直到市场价格刚好等于利率（以及必要的折旧率）（Böhm-Bawerk, 1959b: 78 - 122）。

因此，与历史主义者的超现实主义相反，庞巴维克现在批评克拉克及其信徒的静态资本概念是“少现实主义”（hyporealism），或者完全缺失现实主义。每个生产过程都要花费时间，在目标实现之前，必然会经过一系列体现为高度异质和不同组合的资本品形式的阶段。这些资本品无论如何都不会自我复制，相反，它们是作为具体企业家行为和一系列决策的结果，被逐步地创造出来；缺少企业家行为和决策，已经创造出来的资本品也会耗尽乃至消失。

另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庞巴维克坚持资本品的价格不是由生产的历史成本决定的，相反，是由对其未来生产力根据利率贴现后的价值决定的，因此，生产力不可避免总是跟随（取决于时间偏好的）利息，而不是相反。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供应和需求共同决定均衡中的利率，也就是说，对时间偏好的主观认知决定供给，但企业家根据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也就是说基于客观考量）决定需求。这一方法与马歇尔提出的解释市场中价格决定的方法是相似的，因此庞巴维克和奥地利学派也同样予以拒绝。他们强调，当企业家需要资金时，企业家只是作为工人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中介，工人和生产要素所

有者以工资和租金的形式提出需求，同时作为交易，他们向企业家让渡了未来具有更高价值但只有当生产过程结束时，才是可获得的商品的所有权。

因此，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看，资本品的供应方和需求方都依赖于对时间偏好的主观认知。在利率决定领域的论证思路，与庞巴维克用来批驳马歇尔时的方法相呼应，他批评马歇尔至少在价格决定过程的一个方面，试图保留古典经济学派典型的李嘉图式的老客观主义。

维塞尔和主观主义的机会成本概念

另外一位经常被引用的奥地利学派理论家是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Friedrich von Wieser, 1851—1926)，他是庞巴维克的大舅哥，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先后任教于布拉格和维也纳。维塞尔作出了一些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发展了门格爾的主观主义的成本思想——将其理解为行为者赋予他或她行动时所放弃的其他目的的价值。还值得一提的是，维塞尔创造了新词 *grenznutzen*，“边际效用”的说法由此而来 (*grenz* 的意思是边界，*nutzen* 的意思是效用)。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奥地利学派来说，维塞尔受洛桑学派的影响更大。实际上，米塞斯甚至写道：

(维塞尔) 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家，总的来看，他的思想更有害而非更有用。他从没有真正理解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思想精髓，这一局限使他犯下了很多不幸的错误。他的归属理论 (imputation theory) 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有关价值计算的思想证明了他不能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成员，而只能算是洛桑学派 (包括瓦尔拉斯等人，以及经济均衡的思想) 的成员。
(Mises, 1978: 38)

均衡模型和实证形式主义的胜利

20世纪3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都是把均衡模型作为一种辅助的智力工具，用来发展解释真实市场过程的理论。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再把均衡视为是一种纯粹的辅助工具，并逐渐把它视为唯一重要的研究对象。在这一时期，新古典经济学家把均衡推向了研究的焦点，而经济学家普遍失去了研究动态市场过程的兴趣。于是，奥地利学派学者的研究逐渐变得孤立，他们自己也常常意识不到在主导的经济学思想中，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实际上，正如希克斯所说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原来并不是主流经济学之外的奇特分支，在此之前，它们才是主流，而其他学派（关注均衡的新古典的先驱）则是非主流（Hicks, 1973: 12）。

事实上，很久以来，这两种对均衡的认识——均衡作为辅助工具与作为研究焦点——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是隐而不见，帕累托便是一个例证。在1906年，当谈到求解描述均衡的方程组时，帕累托承认均衡的纯辅助性质：

从实际操作来说，这超出了代数分析能力所及的范围。……这样的话，双方的角色将会发生变化：不再是数学帮助政治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帮助数学。换句话说，即使所有这些方程都是已知，求解方程组的唯一手段是观察市场给出的实际解决方案。（Pareto, 1971: 171）

然而，在同一书中，当评论早先由埃奇沃思提出的无差异曲线概念时，帕累托总结说，真实的市场过程甚至“个体都可以忽略不计，只要把他们的偏好的记录留下”（Pareto, 1971: 120），就能决定经济均衡。

当我们纵观帕累托所有作品时，上述现实主义和均衡模型之间

的紧张（或矛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帕累托不仅是一位一般均衡理论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开创了财政社会学的意大利传统。

上述经济学思想的演进，深受“泛物理学主义”（panphysicalism）和方法论一元主义的影响，当时石里克（Schlick）、马赫（Mach）以及其他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者叫嚷着要把物理学使用的方法，如明确的函数关系及实验室实验，应用于所有科学，包括经济学。深受法国物理学家路易·普安索（Louis Poinsot）作品影响的瓦尔拉斯公开支持这一方法论目标，熊彼特在1908年出版《理论经济学的性质和要意》（Schumpeter, 1908）后，也一心一意地追求实现这一目标。

至少在方法论上继续支持奥地利学派立场的维塞尔，对熊彼特的“泛物理学主义”作出了深刻的批判性评论（Wieser, 1911）。维塞尔特别批评熊彼特受诱于方法论工具主义（这后来被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的实证主义者所采用），以及他试图把物理学和力学的方法应用到经济学中（哈耶克后来称这种错误为“唯科学主义”）。瓦尔拉斯的例子特别好地说明了这一错误。瓦尔拉斯在读完普安索的著作后，便立刻倾心于作者在书中描述的物理学系统中相互联系的不同部分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下保持着均衡。瓦尔拉斯说，他在几天内读完普安索的书，并决心把它作为自己研究计划的样板。从那时起，瓦尔拉斯的目标就是为经济学做普安索已经为物理学和力学所做的事（Mirowski, 1991）。

毫无疑问，这一研究方法在奥地利学派理论家看来是极为错误的，他们关心的是建构关于真实的、动态的、永不均衡的市场过程的理论。另外，维塞尔批评“泛物理学主义者”没有认识到理论经济学法则的本质必然是生成—因果性质，而不是函数关系，因为现象的起源只有通过内省才能发现，而函数关系则意味着事物是同时发生的，其中不允许有时间、企业家创造性等存在。

然而，直到米塞斯和哈耶克，奥地利学派理论家才完全认识到

他们与其新古典均衡同事之间的方法论鸿沟。这个认识得益于另外两场涉及奥地利学派的争论：关于计划经济计算不可能性的争论以及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辩论。在下面几章，我们将具体研究米塞斯与哈耶克的主要贡献，以及这些争论对奥地利学派范式随后发展的重要意义。